

优势产业集群发展与中部经济崛起互动研究

丁建军^{1, 2}

(1. 湘潭大学商学院, 湖南湘潭 411105;

2. 吉首大学商学院, 湖南吉首 416000)

摘要: 面对区位优势、发展基础不如东部, 政策优惠、国家投资不如西部的困境, 以比较优势产业为突破口, 走集群发展之路是实现中部经济崛起的可行途径。然而, 优势产业集群效应的进一步发挥又依赖于中部经济的发展, 二者之间是双向的互动。研究二者之间实现良性互动的机制是实现中部经济崛起必须要突破的课题, 也是本文研究的内容。

关键词: 优势产业; 集群发展; 中部崛起; 互动

中图分类号: F83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 6487(2007) 24- 0137- 04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05XJY025)

0 引言

“中部崛起战略”是在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之后, 中部各省为防止出现经济“中部塌陷”的局面而纷纷寻求自身经济发展所提出的指导思想。然而如何才能实现“中部崛起”呢? 理论界曾给出了以下选择, 如借助产业梯度转移的惯性, 运用低成本优势吸引和承接东部地区制造产业的转移; 通过政策引导组建大型城市群(如正在组建的武汉城市群、湖南3+5 城市群、安徽中原城市群等) 以实现区位优势, 增强投资吸引力, 弥补国家政策方面的劣势, 实现经济迅速发展。目前, 第一种选择已遭到了现实的挑战, 虽然中部部分地区确实承接了一些产业转移, 但成不了气候, 东部地区制造业没有继续大规模转移的迹象。第二种选择正被积极实施, 现在评价其效果为时过早, 但明显的是城市群的形成, 首先提供的只是一个广大的市场, 如果没有自身优势产业随市场扩大迅速发展, 最后又将是为其他地区产业发展提供“嫁衣裳”。因而, 找准突破口是实施“中部崛起战略”的关键, 这个突破口就是各省自身的相对优势产业, 发展途径则是仿效东部发达地区(浙江、广东、福建等) 实施优势产业的集群发展。那么什么样的产业才是相对优势产业呢? 笔者以为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加以选择: 产业的资源优势、产业发展的机制优势、产业发展前景(市场) 优势。显然, 一个地区的优势产业不是唯一的, 而且, 从不同的角度出发, 得出优势产业的结论也不一样。因此, 在优势产业的甄选时, 必须统一各部门的意见。比如, 湖南的优势产业是什么? 人们曾一度认为湖南经济就是“烟草加稻草”经济, 现在有人认为旅游产业, 甚至工业是湖南的优势产业。但笔者从甄选优势产业的三个维度分析, 认为文化产业是湖南的主要优势产业, 而且也有学者提出应将湖南的文化产业作为支柱产业来发展。^[1]同时, 找准优势产业之后, 又面临着如何发展的问题。从世界范围来看, 那些产业创新活跃、产业竞争力强、区域经济发展迅速的地区, 如意大利的东北部和中部地区、美国的硅谷地区、印度的班加罗尔地区以及我国的珠三角和长三角地区, 都是产业集群普遍发展的地区。^[2]可见, 产业集群是产业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 也是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的可行途径。而且, 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对中部地区经济崛起的作用不是单向的, 其集群优势的发挥也依赖于经济的发展水平。换句话说, 就是优势产业集群发展与中部经济崛起是一个互动的过程, 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互动是我们的目标。揭开两者之间互动的机理和模式以及政府在这个过程中的角色定位是本文的研究内容。为了使文章说理更加具体和富有针对性, 作者以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为例加以说明。

1 中部经济崛起呼唤优势产业集群发展

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无疑给了中部地区当头一棒，区位优势、发展基础不如东部地区，政策优惠、国家投资不如西部地区。各种经济发展要素不仅“东南飞”，而且也开始“西部飞”。在这种夹缝中求生存，中部地区必须卧薪尝胆，挖掘和开发出自身的优势和竞争力。这种竞争力的来源就是通过产业集群来扩大自身优势产业的优势。

1.1 区位、政策劣势是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的现实

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基础稍好于西部地区，但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从各省份所创造的GDP值、人均GDP值、企业数量、跨国公司落户数量、全国500强企业数量、铁路、高速公路里程数量等数据指标的比较来看，中部地区省份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区省份。而且，更为令中部地区担忧的是在对经济发展要素的吸引力上与东部地区的差距越来越大。这主要体现在东部地区利用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优势，在与外资经济的互动与融合中，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积累了丰富且良好的社会资本。如较为规范的市场运行机制、人们强烈的商业意识、企业家精神、法律意识、团队意识、创业意识、诚信意识等。同时，东部地区各省经济呈现出各自的特色，地区分工、产业集群现象普遍，如浙江、广东、福建各省几乎每个市级行政区都有自己的产业集群，这种大集群、大市场的发展态势培育了产业的知名度和竞争力，进一步吸引资本、人才等要素的流入。再加上地理位置临近海域，有着发展对外贸易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可以说，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东部地区占尽了经济发展的“天时、地利、人和”。相对于西部地区而言，中部地区有一定的优势，如经济基础、自然条件、劳动者素质稍好于西部地区。但其在引进外资、税收、劳动者就业等政策劣势、资源劣势以及国家投资等方面的劣势已对其原有的优势造成严重的挑战。目前，西部部分省份通过以大型企业集团为中心的轮轴式产业集群发展使其产业优势明显凸显出来，如内蒙古的乳业、四川的电子产业等。可见，正视现实，在逆境中求生存是中部地区的现实选择。

1.2 大力发展比较优势产业是中部经济崛起的出路

从前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部地区在区位优势上已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而且这种差距还在拉大。西部地区则因为政策优势明显改善了自身劣势，经济发展上大有迎头赶上之势。但正如古典经济学家李嘉图所指出的，任何一个国家、地区都有自身的比较优势，通过挖掘和发展自身的比较优势，在动态比较优势原理下可以实现经济的赶超。所以，中部经济崛起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自身的比较优势产业。然而什么样的产业才是比较优势产业呢？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分析选择：产业发展资源、产业发展机制、产业发展前景。中部地区各省自身的优势产业至少要在这三个方面具有比较优势。所谓产业发展资源优势是指拥有产业发展的投入要素优势，如湖南文化产业的这种资源优势主要体现在：丰富的文化遗产，如马王堆汉墓文化、南岳佛教文化、凤凰少数民族古城文化等；独特的自然景观，如张家界、桃花源等；名人文化，如曾国藩、毛泽东等；娱乐文化，如湖南广电集团的品牌栏目、品牌主持人等。所谓产业发展机制优势则主要指比较优势产业的运行模式灵活、规范，符合现代企业、市场运行机制。湖南文化产业发展机制优势体现在对各种文化资源的开发都采用了现代企业运作模式，形成了相应的企业集团，这些企业集团内部运行方式灵活，企业集团的实力和竞争力较强，如湖南广电集团、湖南出版集团等。产业发展前景优势则指比较优势产业应该是一种朝阳产业，市场需求旺盛且产业关联度较强的产业。湖南文化产业显然具备这种优势，知识经济时代强调文化消费，而且文化产业内涵和外延广阔，产品的可深加工性强，产业关联大。显然，中部各省找准自身比较优势产业并加以大力发展是中部经济崛起的突破口。

1.3 实施集群发展是提升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

比较优势产业怎样发展和壮大自身的优势，并最终通过动态比较优势原理实现中部地区经济赶超，关键在于持续不断地进行创新，巩固和增强自身的核心竞争力。具体来说，一个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持续不断的创新能力、规模经济所带来的成本优势以及以信任为基础的良好社会资本积累。其中，社会资本是基于人与人、企业与企业之间的信任和合作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关系网络的总和，它是一种能够提高生产效率的区域空间组织资源，具有很强的社会生产性并且难以通

过理性投资形成。[3]因而，比较优势产业要能担当起引领中部经济崛起的重任，就必须探寻一条能培育上述竞争力的发展道路。然而，自马歇尔以来的经济学家们对产业集群理论的研究都证明了产业集群能通过近距离激烈竞争、知识外溢促进产业创新，通过重复博弈促使信任和声誉的形成，降低交易成本，积累社会资本，通过对公共设施、“劳动力蓄水池”等公共物品的共享，降低成本，实现规模经济。同时，实践也证明产业集群普遍的地方，产业创新活跃、竞争能力强。因此，实施集群发展是提升比较优势产业竞争力的根本途径。目前，湖南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初见端倪，但还不明显，也远未到能充分发挥集群优势的程度。总体来讲，湖南文化产业是按照“一区三带”、“四轮驱动，两翼齐飞”的指导方针来发展的。^[4]“一区”指以长沙为中心区，“两翼”指旅游业和会展业，“三带”为京广线、潇湘流域和大湘西三个特色文化带，“四轮”是广电、报业、出版、娱乐。“一区三带”为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发展绘出了雏形，其中长沙文化产业集群有了一定的发展，尤其是娱乐业，且有了一定的影响力。而“三带”的集群程度还很低，主要因为企业主体太少。因而，大力发展以大企业集团为中心的轮轴式产业集群是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

2 产业集群发展优势的进一步发挥要以经济崛起为基础

产业集群既是一种状态，更是一个过程，作为一种产业发展的组织形式，它是一个有着生命周期的成长过程。从静态来看，它是孕育产业竞争优势的温床，是使比较优势产业引领中部经济崛起的可行途径；从动态来看，产业集群的成长，产业集群优势的发挥又需要区域经济发展的支持。

2.1 巨大的市场需求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引擎

从产业集群的形成方式来看，产业集群可以分为诱致生成形、引导培育形和强制培育形。^[3]不管以何种方式形成，区域内对该产业产品的巨大需求是产业发展、产业集群的最根本动力，这在第三产业集群发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当然，这种市场需求并非一定为最终需求，而是指广义上能使产业所生产的产品得以销售的一切需求。而且，这些需求越是多元化，越能促进产业的创新；需求量越大，越会促使更多的投资主体参与集群，产业集群的优势越明显。相反，若没有区域的经济的发展，经济活力不足，人们收入水平有限，需求不旺，集群内部将出现恶性竞争，甚至使集群瓦解，自然集群发展优势无从谈起。湖南文化产业集群的初步发展正是在广大的市场需求下产生的，如消费者对“文学湘军”、“出版湘军”的偏爱，对影视业中“湖南现象”的追捧，长沙歌厅文化的火爆都是“文化湘军”的集群发展的直接动力。目前，省政府积极促成“3+5”城市群建设，积极提倡和引导居民进行文化消费，举行大量的文化节庆活动等都将扩大文化产业的市场需求，这有利于文化产业加速集群发展，并更好地凸显集群发展优势。

2.2 高水平城镇化建设是产业集群发展的载体

城镇化水平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直观表征。一方面，产业集群发展有利于加速城镇化建设，另一方面，城镇化建设又是产业集群发展的载体。产业集群发展需要大量配套设施的支持，配备齐全的服务部门、公共设施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前提。寻求公共基础设施的共享，降低成本既是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也是产业集群获取规模经济实现成本优势的源泉之一。近年来，我国各地纷纷圈地建设工业园区，“筑巢引凤”，其实也是基于上述认识。另外，目前中部各省正在实施的城市群建设，无论是在主观还是客观上都将为各自优势产业的集群发展创造一定的条件。可见，一个地区经济越发展，其城镇化水平越高，该地区自身产业集群发展的平台越多，集群发展的趋势越明显。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实践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作为湖南文化产业发展“中心区”的长沙，城市化水平较高，尤其在“长株潭”一体化取得实质进展后，该区的文化产业集群发展速度加快，娱乐产业的集群现象更加明显。而另外“三带”，即京广线、潇湘流域和大湘西三个特色文化带的集群发展速度较慢，甚至难以发现存在集群现象。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这三个带形区域城市化建设水平相对落后，城市规模偏小，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所必须依赖的配套服务、基础设施跟不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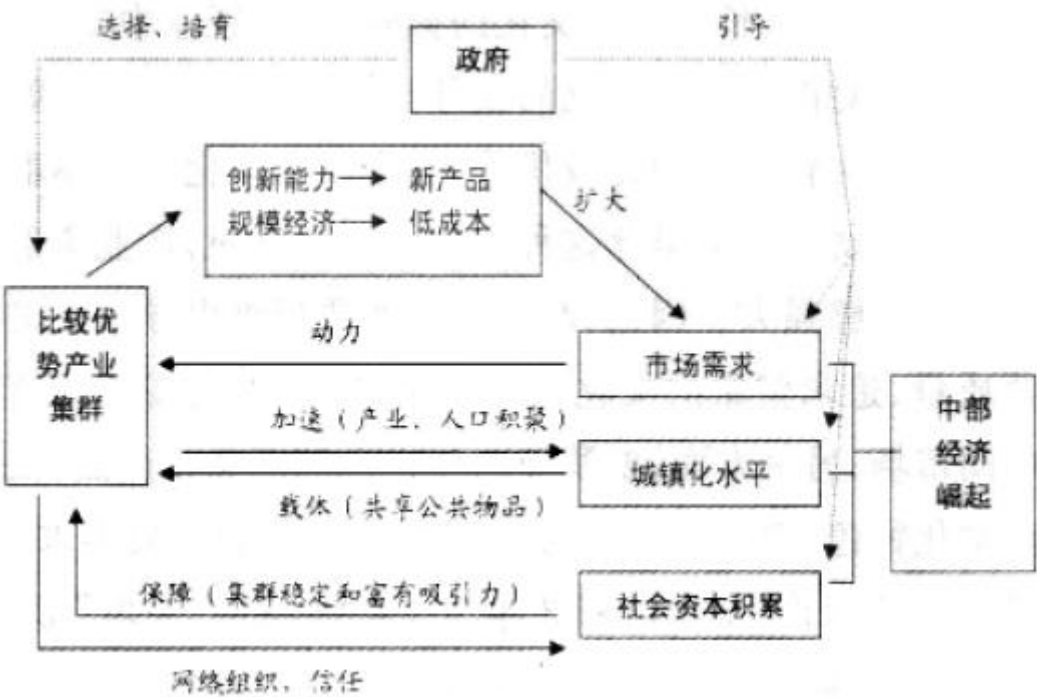
2.3 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是产业集群稳定发展的保障

如果说巨大的市场需求，高水平的城镇化建设，完善的基础设施是一个地区区位优势，经济发展水平的外在表现的话，那么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则是一个地区经济发展的深层内涵，区位优势的真正魅力所在。日本学者福山发现，在现代自由经济中，最成功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那些具有良好社会资本的国家和地区，可以说社会资本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源。^[5]在前面的论述中我们提到产业集群可以通过使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重复博弈，形成信任，积累社会资本。同样，良好的社会资本也是产业集群稳定发展的粘合剂，是协调集群内部企业关系的共同价值体系。随着产业集群规模的扩大，集群内部企业数量增加，在众多的企业数量之间形成博弈均衡的难度增加，企业主体的机会主义倾向增强，如果没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对企业主体的约束，集群内部良好的秩序将遭到破坏，集群的稳定性受到挑战。同时，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有利于降低内生交易费用，保障集群内部企业稳定和较高的投资回报率，进而集群更加稳定。目前，我国总体的社会资本积累不够，这也是我国产业、企业总体竞争力不强的根本原因。其中，中西部地区社会资本积累程度更低，事实上对产业集群发展造成了不良的影响。湖南文化产业的发展，一方面是集群程度不高，产业的规模偏小，竞争力不强；另一方面，在集群程度稍微明显的长沙地区，集群内部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已不容忽视，这种缺乏协作意识、竞合意识的“窝里斗”行为严重破坏了文化产业集群的稳定性，其他投资主体也因惧怕恶性竞争而不敢加入集群，从而影响了集群的进一步发展和产业规模的扩大。而在三个特色文化带，却因为市场不够规范，商业意识、企业家精神不强，而使很多文化资源未得到开发，产业集群发展相当缓慢。

3 优势产业集群发展与中部经济崛起互动模式及政府角色定位

3.1 优势产业集群发展和中部经济崛起互动模式

在前面的分析中，笔者指出中部地区必须以比较优势产业作为突破口，通过集群发展的模式所带来的创新能力、规模经济和社会资本积累强化比较优势产业的竞争力，在动态比较优势原理下，引领中部经济崛起。而中部经济崛起将表现为居民收入增加，市场需求扩大，城镇化水平提高和良性社会资本积累增加。而扩大的市场需求、较高水平的城镇化建设和良性社会资本的积累反过来将进一步促进产业集群，发挥集群优势，提升产业竞争力。这种互动过程如下图所示：



其中，中部经济崛起是目标，市场需求、城镇化水平、社会资本积累是中部经济崛起的具体表现。比较优势产业集群是手

段。在整个过程中，政府既不是“守夜人”，也不是“运动员”，政府进行准确角色定位相当关键。

3.2 政府角色定位

准确进行政府角色定位，也就是说政府在实施比较优势产业集群发展以实现中部经济崛起过程中应发挥恰当的作用。具体而言，就是政府应为上述互动模式实现良性互动创造外部条件，或者说政府应演好以下四个角色。

（1）比较优势产业集群的引导培育者。产业集群的形成可以是诱致生成，也可以是引导培育或强制培育形成。其中诱致生成完全由市场需求带动，企业自发集聚发展而成，由于其自发性，集群比较合理，但速度较慢，所耗时间较长。而强制培育形成又往往因为政府的“拉郎配”，使企业迅速“扎堆”在一起，企业间缺乏应有的业务关系、基本的信任和共同的价值观念，难以形成和发挥集群优势。对于中部地区实现经济崛起来说，选择引导培育形产业集群方式比较合适。一方面，市场对于某一产业的特别需求不明显，中部经济崛起的紧迫性也不允许市场慢慢作出选择，另一方面，强制培育难以发挥集群优势，更难以担当引领中部经济崛起的重任。而引导培育则可以通过政府准确选择比较优势产业，在现有优势企业的基础上通过相应政策引导相关企业迅速进行分工合作而实现产业集群，既保障了集群的合理性，也能节省时间。如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中，政府首先应该担当的就是这一角色。首先，通过论证文化产业是湖南的主要比较优势产业之一的合理性，统一各部门的意见。其次，在现有“一区三带”、“四轮驱动，两翼齐飞”规划的基础上，依托文化产业中现有的大型企业集团，如湖南广电集团、湖南出版集团、张家界旅游有限责任公司等，通过引导培育大量与这些集团公司有业务关系、竞争和合作关系的小型专业化企业，尽快形成这种轮轴式的文化产业集群态势。其中，通过政策、利润、业务引导文化产业投资者加入集群是关键。

（2）市场需求的刺激和“引进”者。巨大的市场需求是产业集群形成的动力。目前，中部地区各省经济相对落后，居民收入有限，再加上消费者需求偏好多样化，难以对某一产业形成特别强烈的需求，无疑影响了产业集群的形成和规模的进一步扩大。因此，刺激和“引进”对该产业的需求就成了政府的第二项重任。湖南文化产业发展中，消费者对“文学湘军”、“出版湘军”、长沙歌厅文化的偏爱，对影视业中“湖南现象”的追捧，对南岳佛教文化的膜拜，对神秘湘西文化的好奇铸就了湖南文化产业的比较优势，也为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原动力。但毕竟这种文化需求还有限，产业集群发展的动力不够强大。因而，政府一方面要积极引导市民讲究生活质量，追求健康的文化和娱乐消费，大力发展文化消费的中间市场；另一方面，要积极向外推介湖南文化产品，强调湖南文化特色，举办大型文化活动，“引进”文化消费需求。比如通过成功运作“金鹰电视艺术节”，发展湖南“星城”形象，就刺激和“引进”了大量的文化需求。

（3）城镇化建设的推动者。高水平的城镇化建设是产业集群发展的载体，城镇中完善的基础设施和相应的服务配套体系是产业集群内部企业共享资源，降低外部交易费用，发挥产业集群低成本优势的重要外部条件。中部地区普遍城镇化水平较低，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相对落后，这是阻碍产业集群发展的重要障碍。政府应该积极推动城镇化建设，为产业集群发展扫除障碍。目前，湖南、湖北、安徽等省正在积极组建自己的城市群，这是一项意义重大的举措，一方面可以扩大和创造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为产业集群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平台。“长株潭”一体化，“3+5”城市群，大湘西联合开发战略的构想为湖南文化产业的集群发展带来了曙光，当前，政府要做的是积极实施这些构想，快速推动城镇化的发展。

（4）良好社会资本积累的倡导者。福山通过实证研究得出结论，社会资本不仅是产业集群的粘合剂，更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根源。越是社会资本积累丰富的地方，其产业集群现象越普遍，经济越发达。^[6]社会资本由于其固有的特性，难以在短期内通过直接投资形成，它是一种文化的积淀。良好的社会资本包括制度（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文化、习俗和惯例等因素。目前，中部地区最缺乏的就是这种“软生产力”，产业集群内部企业难以植根于该区域，企业之间冲突、不规范竞争行为不断，集群难以稳定和扩大规模。因而，通过各种途径倡导社会资本积累也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一方面可以通过建立正式的制度规范、法律法规，严厉惩治不利于社会资本积累的行为；另一方面，应通过舆论导向、教育途径积极培养人们的诚信意识、团队意识、商业意识、企业家精神等。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发展中的最大障碍也是良好的社会资本积累不够，诚信和协作意识过于淡薄。有学者指出，湖南人精神中“领导情结”太重，只愿做主角，不愿当配角。这种意识对于湖南文化产业集群发展具有很大

的破坏性。因而，政府的当务之急是破除人们的这种意识，倡导诚信和团队精神建设。

参考文献：

[1]陈国生，张东风. 关于加快湖南文化产业发展的思考[J]. 经济地理, 2005, (1).

[2]曹阳. 产业集群形成机理综述[J]. 生态经济, 2006, (8).

[3]吴德进. 产业集群论[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4]杨正午. 加快湖南文化产业发展[J]. 求是, 2003, (14).

[5]弗兰西斯·福山. 社会资本、公民社会与发展[J]. 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03, (2).

[6]弗兰西斯·福山. 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M]. 北京：远方出版社，1998.